

← (上接12版)

期,他们的私交也很不错,林语堂请胡适一起看戏,胡适请林语堂到自己家里欣赏老家安徽特产,林语堂在家里宴请胡适也是常有的事。陈子善教授告诉我们,胡适等新月派搞平社,林语堂也是后期主要参与者。尽管如此,两人在脾性及许多看法上都不尽相同。林语堂有诗人气质,受欧陆柏格森、海涅影响。林语堂与胡适很大的不同是,林语堂坚定地认为,中华民族没有退路,只有通过殊死一战以求重生。华尔希到访上海,林语堂约朋友接风,说胡适也在上海,但他不想邀请,除非华尔希想要请。这很能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,林语堂应该是觉得胡适来了谈不来,他曾在家里宴请赛珍珠和胡适,就谈不来。林语堂和其他新月派文人就更谈不来了。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到访,林语堂也没兴趣。现在我们谈到现代散文家,往往把梁实秋和林语堂并提。梁实秋到哈佛完全拜倒在白壁德门下,回国后一反以前的文风,讲文学纪律之类。这个林语堂早就经历过了,在哈佛和吴宓坐同一条板凳上课,对梁实秋大肆宣扬白壁德学说肯定看不上。

我在另一篇演讲中提到《中国评论》周报的编委成员。《中国评论》周报的出现在现代中国知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,它标志着新一代中国知识群体走上舞台,用英语向世界发言。创办者都是在某专业学有所长的人士,比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陈钦仁、律师桂中枢、经济学家刘大钧等。只有林语堂是比较文学、语言学出身。其中和林语堂关系较紧密的是全增嘏、潘光旦、林幽,他们后来都是论语社的主干成员。也就是说,他们不光有自己的专业,还是“文化人”,对中西文化有一种关怀。林语堂给华尔希接风开出的名单也很能说明问题:邵洵美、潘光旦、全增嘏、李济、丁西林、徐新六。

其中李济是考古学家,丁西林是物理学家,林语堂介绍徐新六时加了一个括弧:[银行家,睡觉前读法郎士(Anatole France)的法文作品]。

全增嘏是位受西式训练的哲学家,清华毕业后,于1923年赴美留学,在斯坦福、哈佛学哲学,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、大同、厦大、光华、暨南大学教授,1949年以后到复旦外语系,后又转到哲学系,一直到1984年病逝。潘光旦就没这么幸运了。他也是清华毕业,1922年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生物学,后来转向优生学,归国后任光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,后转到清华社会学系,没能躲过后来的运动。这两位不光学有所长,也有文学天赋。林语堂去欧洲期间,全增嘏代替他写“小评论”专栏,林语堂回来后,他继续和林语堂轮流隔周负责该专栏。潘光旦在《中国评论》周报负责书评栏目,涉及的知识面很广,在《论语》等杂志也经常发表文章。

全增嘏还和林语堂、吴经熊、温源宁一起办了英文《天下》月刊,这份杂志主要由吴经熊、温源宁操办,全增嘏和林语堂担任编委。吴经熊和温源宁也是林语堂社交圈的重要人物。温源宁和林语堂本就是北大英文系的同事,林语堂曾在东吴大学教英语,当时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由吴经熊主持。温源宁和吴经熊都是民国时期最具洋绅士气质的学人,英语流利,言谈举止也别具一格。温源宁曾在《中国评论》周报撰写系列小品“不够知己”,对民国名人评头论足,林语堂把其中一些译出刊登在中文的《人间世》杂志,让知识界热闹了一番。这些英文小品写得精彩,主要是温源宁真正懂得英国式幽默,严谨中带着轻松游戏。温源宁和钱锺书曾亦师亦友,现在我们可能只知道钱锺书而不知道温源宁了。吴经熊是位出色的法学家,他曾和时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(Oliver Wendell Holmes Jr.)保持亲密通讯联系,发表他们

的来往通信。吴经熊和林语堂关系一直都很好,抗战时吴经熊一大家子人,经济上很困难,写信给林语堂求助。林语堂和华尔希也曾试图协助,最终也无能为力。华尔希曾对林语堂表示,吴经熊写的东西太西化了,没有中国元素,没有一点市场,你可千万不能向他学。

另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是林语堂和《西风》杂志的关系。它是由黄嘉德、黄嘉音兄弟创办,林语堂为“顾问编辑”。黄嘉德、黄嘉音虽然属于晚辈,但和林语堂都是圣约翰校友,可以说是真正的林系门徒。其实《西风》第一期于1936年9月1日出版,而林语堂8月11日离开上海去美国,但《西风》却是完全依照林语堂的理念创办,可以说是百分百的林系刊物。《西风》是一份翻译刊物,专门翻译刊登西洋杂志文章,因为林语堂认为中国文人需要学习西人怎样写文章。《西风》月刊以“译述西洋杂志精华,介绍欧美人生社会”为宗旨,创刊后便大受欢迎,而且抗战中一直没有停刊,一直到1949年,非常不容易。

林语堂在30年代上海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圈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洋人,当时上海有各种俱乐部、协会组织,从林语堂的演讲就可以看出。这又可以分几种人。首先是来到上海的左翼文人、革命家。比如,斯诺和斯诺夫人,都曾和林语堂有交往,不过40年代在海外,他们是论敌。林语堂当然是输了,现在北大还有斯诺的纪念墓,又有多少学生知道林语堂?林语堂在晚年曾说,当时到中国来的有两个女性革命家,普罗姆和史沫特莱,他曾带史沫特莱参加平社活动。

林语堂在上海结交的最重要的洋人当然是赛珍珠及到访的华尔希了。他们如何结交、如何合作、如何分手,我在拙著《林语堂传》中有详尽交代,这里也不多讲了。我只是想强调一点,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历史叙述,但从这个客观的叙述中,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,赛珍珠、华尔希和林语堂的关系是双向的,互相欣赏,走向互相合作。说林语堂是赛珍珠“发现的”等等,都很片面。他们的分手,政治倾向不同占主要因素。“文化人”离不开政治,林语堂在《语丝》时期就强调“要谈政治”,因为政治关涉到你的理想、你的良知,没有这些,“文化人”就真成了神仙道士,林语堂不是这种人。

最后这一批洋人朋友往往都是家庭朋友,这应该和林夫人廖翠凤很有关系。廖翠凤是圣玛丽亚女校毕业生,英语一



前排右起:鲁迅、许广平、周建人;后排右起:孙伏园、林语堂、孙春台



从右至左:鲁迅、林语堂、伊罗生、蔡元培、宋庆龄、萧伯纳、史沫特莱,上海,1933年



林语堂和南洋大学高层管理团队,从左至右:伍启元、林语堂、胡博渊、熊式一、杨介眉
台北林语堂故居藏

流,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,30年代在上海经常和林语堂一起出席社交活动,比如鲁迅日记中都看到林语堂夫妇经常一起赴约。从林语堂的演讲活动可以看到,当时上海有各种妇女协会组织、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等,廖翠凤也应该经常参加活动,结交朋友。林语堂在《吾国与吾民》致谢中提到一群太太女士们,是她们平时在他耳边不断唠叨,要他写中国人、中国文化的书,这些都应该是林语堂夫妇的家庭朋友。我在庄台公司档案里找到弗利兹(Bernardine Szold Fritz)写的一篇“林语堂小传”。当时《吾国与吾民》爆红,急需了解林语堂是谁,弗利兹便写了这篇传记小文,而这也是我至今看到的写林语堂的生活细节方面最生动、最贴切的文字。弗利兹称林语堂气质上是位诗人,非常有见地。我这里不妨再用弗利兹描述的一帮朋友抽鸦片的情景做结尾。

弗利兹没说这次聚会在哪里,当时一帮朋友起哄要林语

堂来试试。于是:

语堂边退边笑,举起双手抗议。

“我是牧师的儿子,”他说,“我做不到。”

大家一起抗议。“哎呀,就这一次。你要试一试嘛,大家都试过啦。”

“不行,”他说,这次严肃起来,“我喜欢看别人抽。看别人抽鸦片真是很神奇,不过同时我也有一种恐怖的感觉,就像有人说看蛇也会感到恐怖一样。毫无疑问这和我的基督教成长背景有关。虽然我已不上教堂,但道德戒律还在。我知道我的手拿不起烟筒把烟送到嘴边。”

“哎呀,就试一次也不会染上瘾,”我们的主人说道。

“啊,要是没人试第一次,还有谁能上瘾呢。你们来吧,别管我了,”他笑着躲开,“我敢保证,我抽雪茄的毛病和你们抽鸦片一样糟糕。可是圣经没有说抽雪茄不好啊!”

(作者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)



林语堂在阳明山故居阳台,约1969年,耿殿栋摄